



杨国强

历史意识
与帝王意志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024

历史意识 与帝王意志

杨国强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杨国强著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110 - 0477 - 2

I ①历 II ①杨 III ①史学 - 文集
IV ①K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3807 号

书 名: 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
作 者: 杨国强

责任编辑 王 玮
整体设计 郑在勇
封面设计 周夏萍
美术编辑 吴光前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 //www dolphin - books com cn](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 - 68997480 (销售)
010 - 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 - 68998879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 张 3 875
字 数 51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110 - 0477 - 2
定 价 15.80 元

“海豚书馆”缘起

沈昌文

俞晓群、陆灏和我，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三结义”。那时，我刚要“退居二线”，但是贼心不死，还想做事。更主要的，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但是，我知道，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

完全没有想到，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我们的“三结义”居然越搞越热火。没有多少年，做出来的东西，无论质与量，都让我惊喜不已。举例来说，先是《万象》杂志；接着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几百本；后面来一个《书趣文丛》，六十来本……这些成绩，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自然，这些书的问世，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恕我不一一列举了。

那时“三结义”的“桃园”在沈阳的“辽教”。以后时过境迁，我们的刘备——俞晓群——迁出沈阳，于是，现在再次“三结义”，改在北京的“海豚”了。

出版社而名“海豚”，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可是海太深了。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可是天太高了……”“‘天使，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海豚痛苦地低鸣。”

现在，解决海豚痛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

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陆灏。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以宏文，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

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二〇一〇年五月

目 录

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 (1)

历史的惯性与盛世的懵懂 (27)

张之洞与晚清国运 (43)

中国人的夷夏之辨与西方人的“夷夏之辨” (64)

杨国强谈晚清的绅士与绅权 (98)

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

一

清人章学诚说过：“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① 在政治学还没有移入中国的时代里，史学曾经长久地托负着天下的政治意识：“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已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

^① 《文史通义校注》上册，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版，第524页。

可资也。政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①前代的盛衰起伏之迹便在一遍一遍的翻耕中化为知识、智慧、思想和经验，融入了后来的国运和世运之中。因此，从孔夫子以来，中国人重作史，也重读史。居庙堂之高的人物和处江湖之远的人物，心为“宗社之安危”与“民情之利病”所牵，都对史学有着一种诚意和敬意。

虽说二千多年的议论常常以三代（夏、商、周）为理想，但后起者从已经过去的岁月里寻取镜鉴，则视野和重心大半都在秦汉之后。于是而有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和一代一代推陈出新的史论。其间贯注的滔滔心力，使述史和论史成为中国文化中绵延厚积的传统。今人读古人，容易把他们头脑中的天命观念想得很大。其实历史的中心在人事，述史和论史成为中国文化厚积的传统，正说明了二千年政治代谢之中人事重于天命的理性清明。

① 《读通鉴论》第三册，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版，第1114页。

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里产生过许多辉煌。在一姓之天下的时代里，这是一种王朝的辉煌。但就“政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而言，更引人注目并能催人长思久想的却往往是王朝的坍落和崩溃。秦始皇灭六国，置郡县，为后来的历史重造了轨辙。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影响是不灭的。然而秦汉易代之后，贾谊作《过秦论》，思虑所及，全在前朝的兴亡之间：“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① 这是一个久耐思索的题目。在他之后，一个一个王朝嬗蜕相续于此兴彼亡之中。因此，唐人杜牧作《阿房宫赋》，仍然从这个题目说起，而感慨所寄，则统括了后来一个一个倒塌了的王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将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② 其间

① 《贾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第3页。

② 《古文观止》，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版，第515页。

的反思，显然包含着更富广度的历史内容。这些文字相隔八百余年，以一种共相写照了古代中国人读史之际的忧患心结。每一代人的忧患因每一代人面临的世局纷披而不同，但每一代人的忧患都会在比照古今中显示出深刻的历史意识。

一姓之王朝在兴亡中前后嬗蜕，反射了二千多年历史里的盛世、衰世和乱世。贞观年间，侍御史马周作奏议说：“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然后对唐太宗恳恳而言：“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持当年而已。”他比较了盛世、衰世和乱世，怀着一腔惕厉之心为天下筹久远。因此，读奏议的帝王掩卷深思而“称善久之”^①。开国的君臣常常是从衰世和乱世中立起来的，他们的阅历决定了他们心多警醒。而究其底里，惕厉的本义正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记十一。

是一种畏惧。它们使传统中国最有权力的这一部分人从眼前想到后来，面对衰世和乱世留下的疮痍战战兢兢，不敢自是，不敢自喜，不敢自负，不敢自大。唐太宗君临天下六年之后曾对近臣说：“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情伪，无不知之。及居大位，区处世务，犹有差失。”^①这些话表达了帝王的内省，也表达了帝王的自抑。于是，作为已经过去了的历史，衰世和乱世制束了开国的君臣。这是一种被迫的制束。然而由此产生的安天下而后安宗社的清醒，却以实实在在的兴利除弊为后来的盛世筑成了初基。世人常常悬想帝王的纵心所欲，但在衰世、乱世转向盛世的过程里，帝王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个人自由和个人意志。康熙曾经营造了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然而晚年自述，说的都是辛苦和疲惫：“予年将七旬，在位五十余载，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未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未敢

^①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记十。

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岂劳苦二字所能概括？”这是一种不易承受的重负，又是一种无法解脱的重负。因此，“身当暮年，每览老臣致仕之奏，未尝不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① 后人读史，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一种帝王的勤勉敬业，也可以看到一种帝王的身不由己。

帝王的勤勉敬业和帝王的身不由己，既出于贾谊在《过秦论》里对前朝兴亡的那种长思久想；也出于马周在奏议里“为子孙立万代之基”的那种殷殷悬望。其间自多创盛世和守盛世的苦心。然而竖看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称得上盛世的朝代其实并不多见。士人论史，常常因之而感慨惘然：“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其国常至于不可救者，何也？所忧者，非其所以乱与亡，而其所以

^① 转引自《清代通史》上卷，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六年版，第815—816页。

乱与亡者，常出于其所不忧也。”^① 每一个曾经有过辉煌的王朝最终都会在衰乱中走向了局，于是盛世便不能成为一种常态。民间人惯看盛衰起伏，熟视之后，便催化出民间的史论。《三国演义》卷首有一首词，其中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在这种兴亡无常的咏叹里，多的也是感慨和惘然。

一代一代的君与臣都在向历史求教，而一代一代的历史都在演进中越出了帝王与人臣的预想悬望。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也是一种牵动人心而富有思想魅力的矛盾。这种矛盾产生于历史过程之中，只有历史过程本身才能说明这种矛盾。历史能够一遍一遍地撰写，其意义和价值正在于此。

二

比之秦代一夕土崩，两汉四百多年历史是在

^① 《苏轼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版，第200页。

瓦解中走向终局的。四百多年时间里，帝王常常抱防患之心而天下往往起落于跌宕之中。后来苏轼曾以此为题目谈汉代历史，统括而言之曰：“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当时之所忧者，韩、彭、英、卢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终高帝之世，相继仆灭，而不复续。及至吕氏之祸，则犹异姓也。吕氏既已灭矣，而吴、楚之忧，几至于亡国。方韩、彭、吕氏之祸，惟恐同姓之不蕃炽昌大也。然至其为变，则又过于异姓远矣。文、景之世，以为诸侯分裂破弱，则汉可以百世而无忧。至于武帝，诸侯之难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炽。则又以为天下之忧，止于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诸侯王既已无足忧者，而匈奴又破灭臣事于汉。然其所以卒至于中绝而不救，则其所不虑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惩韩、彭之难，中鉴七国之变，而下悼王氏之祸，于是尽侯诸将，而不任以事，裁减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权，以为前世之弊尽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权盛，而党锢之难起，士大夫相与搯腕而游谈者，以为天子一日诛宦官而解党锢，则天下犹可以

无事。于是外召诸将，而内胁其君。宦官既诛无遗类，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汉。”^① 他描述了天下跌宕起伏与帝王忧思应变的种种的因果。然而四百多年之间的因果各成片断，它们没有在贯通中进入历史，因此，忧思不能升华为烛照后来的理论思维，当国的帝王便常常成了被时势摆布的人。

而后的历史，由三国而两晋，由两晋而南北朝。原本杂居于边地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五族先后逼入中原，迫使晋室南迁东渡。旧史谓之“五胡乱华”。此后一百三十多年，天下在动乱中走向分裂。北中国由五族演为十六国；南中国则次第易姓，换了五个朝代。比之四百多年的刘汉王朝，这个时期的君权转移可谓起也匆匆，落也匆匆。其改朝换代之间留下的大半是斑斑血泪。南朝宋起晋灭，晋代的最后一个皇帝被“兵人以被掩杀之”。陈起梁灭，梁代的最后一个皇帝死，临危

① 《苏轼文集》第一册，第200页。

之际“绕床而走”，且呼且叫，卒为近臣“执帝衣，行事者加刑焉”。北朝的（北）魏孝庄帝为臣下尔朱兆所囚，缢杀于佛寺，“临崩礼佛，愿不为国王”。（北）周孝静帝被废，“遇酖而崩”^①。在这种血色染成的君位嬗递里，旧朝的强臣一个一个成了新朝的帝王。而本来重心所归的君权则因之而成了一种没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的东西。赵翼后来作《廿二史劄记》，考证说：“宋武（帝）微时伐荻新洲，又尝负刁逵社钱被执，其寒贱可知。齐高（帝）自称布衣素族，非高门可知。梁武帝与齐高同族，亦非高门。陈武（帝）初馆于义兴许氏，始仕为里司，又仕为油库司，其寒微又可知。”^② 这些人虽以强臣作帝王，但来无渊源，去无余响，此起彼伏之间，每一个王朝都犹如世间的过客。与他们相比，被称作“高门”的世族，则大半可以把累世贵显的谱系追溯到汉代。累世贵

① 转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册，中华书局二〇〇〇年版，第586页。

②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十二，《江左世族无功臣》。